

# “儒墨同源”与“法夏绌周”考辨

——兼论墨子里籍问题

杨晓宇

对于墨子与墨学研究，自汉以降，有两个困扰学界的突出问题，即“儒墨同源说”与“法夏绌周说”。针对此观点，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，莫衷一是。笔者认为，这两个问题都与墨子里籍问题有关，倘若把墨子里籍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楚国鲁阳（即今平顶山市鲁山县），则上述问题便不难解决。

## 一、关于儒墨“同源”问题

“儒墨同源说”最早出于汉刘安《淮南子·要略训》，其言曰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刘安为什么要如此说呢？愚以为，它只是儒家“夷夏之辨”的思想在古代学术界的反映。古代的中国，仅是中原华夏民族聚居地的代指，由于华夏诸族自认较周边异族文化优越，有所谓“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”的标准。作为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，既能取得在中原的显赫地位，那么，它就不可能出自荆蛮楚地。由此推论，墨子也就只能出生在儒学之邦的“邹鲁”地区，岂不知，鲁有东鲁西鲁之分，且西鲁为鲁国原郡，是周公的最早封地，后虽并于楚国，但有着丰厚的文化基础。对于这一点，持“儒墨同源”说者却视而不见，不但古代学者如此，就是现代也有人予以否认，张知寒先生就深囿此说而不能自拔，他认为“荆楚文化”“燕晋文化”“戎秦文化”均落后于“邾娄”即“邹鲁文化”。

断言“如墨子不生长在三邾地区，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”。他们根本忽视了墨家产生的时代背景。春秋时期，儒家只是作为一个民间学派而存在，充其量为诸子百家中显学之一，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，儒家才一步步进入中国政治舞台，孔子带其弟子周游列国而不为时用，足以说明这一问题。再者，“儒墨同源”出自刘安笔下本身亦靠不住，刘安为汉代大儒，把墨家与儒家拉在一起，很难说不是出于“儒学中心论”的思想而随意杜撰。汉代固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学术文化遗产，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学术难题，汉人典籍中伪书、伪证、讹语、谬论、串简、脱衍现象到处可见。愚以为墨子与孔子没有直接的授业传承关系，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。

其一，孔子当时为名盛之极的儒学宗师，学生三千、贤人七十七，有名姓者七十二人，或在政治，或在学术、或在军事、或在礼乐等方面，均有一定的造诣和特长，受到后代儒学弟子的崇拜。这些孔门秀才在先秦一些典籍中是很活跃的，汉代之后，更随其师占有孔庙牌位中一席之地，受到上至天子皇亲下至庶民百姓的祭奠。假如墨子受业于孔子，怎么遍查经史子集而找不到有关墨子这方面的只言片语呢？

其二，孔子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，即公元前 478 年。墨子生卒年月，历代说法颇多，现《辞源》“墨翟”条说约在公元前 478 年——公元前 392 年，《辞海》“墨子”条言在公元前 468 年——前 376 年，按此推论，孔子逝世当年或其后十年墨子才诞生。直接受业于孔子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还有一个证据，即《墨子》一书中记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的谈话多次，足见二人交往甚密，鲁阳文君公孙宽是在孔子逝年前

不久被叶公沈诸梁推荐受封于鲁阳邑的，那时还相当年轻，而墨子与鲁阳文君接触时公孙宽已是老年光景，这从史载中推论便知，它可间接说明，墨子不可能受孔子所教。

其三，若说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是指学于儒家传承弟子，那么，姑且假设墨子为鲁国人或滕人甚至宋人，他也只有就近学于孔子传人孔伋子思，因为像墨子这样伟大的人物，求学务精，决不会拜师于末流。即便退一步说，也只有就学于子思门人，儒学集大成者孟轲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言“孟轲，邹人，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。唐·司马贞索隐认为“王邵以人为衍字，则以孟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。”即是说孟子为子思的直接传人，那么，在子思或孟子的言论中，也看不出有丝毫墨子受业于孔儒的迹象。

其四，从《墨子》书中看，墨子也不可能受业于儒术。因为墨子的观点是与孔子针锋相对的，孔子以仁、义为本，其仁、义之别于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，也就是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”墨子则遍扬“兼爱”“尚同”之义，旨在为“小人”说话，认人唯贤，而不是认人唯亲，特别是《非儒》《非乐》《非命》《节葬》《节用》等篇，更是旗帜鲜明地把矛头直接对准儒学本身及其礼乐奢侈思想，这种精神怎能有丝毫受业于儒的迹象存在呢？再以《荀子》一书为例，荀子受业于孟子，是真正的儒学传人，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学贤哲，他既维护了儒家的中心地位，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，又接受了中国由宗法贵族制向官僚地主制过渡时期的新时代曙光，与墨子相比，即可看出传承关系何真何假了。

由以上几点说明，“儒墨同源说”是没有一点根据的。那么，《淮南子》的作者刘安为什么会有如此之论呢？愚以为，除以上所言“夷夏之辨”的因素外，汉代儒者为维护儒学独尊的中心地位，对春秋战国时期儒、墨并称显学的现象就必须加以解释，把墨学并与儒学一脉，一可以任意用儒学观点曲解墨学的各种主张来为自己服务；二可以视墨学为儒学的叛逆，加以否定和批判；三可以名正言顺地“清理门户”，对墨家传人大加惩罚，使墨家从此一蹶不振，消声匿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儒墨同源”说也给后来的墨子里籍问题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难，使持“墨子里籍鲁国说”及其变体“滕州说”者以可乘之机，只言邹鲁地区文化发达而无视“鲁阳说”的充足证据。

## 二、关于“法夏绌周”问题

刘安在谈“儒墨同源”的同时，提出了墨家“背周道而用夏政”的问题，即被后人引述非议的“法夏绌周”的思想。愚以为，“法夏绌周”思想正是针对周王朝日益没落而形成的，也是墨学产生于楚地鲁阳的明证。墨子为什么独衷夏禹之道呢？这里是有其必然原因的：

其一，当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东周王朝如朽木架屋，名存实亡。而为儒家极力鼓吹的周礼周乐，也随之土崩瓦解，难以承继。作为代表一种新思想的墨家学说，对其进行鞭挞批判当然是正确的。不绌周礼，就不能非儒，不非儒就无从言墨，这是水火不相容的问题。正如《庄子·天下篇》所云：“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为墨”。所以，墨子非儒绌周，正如釜底抽薪，其精华闪光之处在于此，其修政为时用，在野受民敬的原因也在于此。正是墨家法夏绌周思想体系

的博大精深，才使之得以成为能与儒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儒家影响的一代显学。

其二，楚国的根本思想是崇夏贬周。楚国远祖为颛顼高阳，“高阳为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，而“夏禹名曰文命，禹之父曰鲧，鲧之父曰帝颛顼，颛顼之父曰昌意，昌意之父曰黄帝，禹者，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”（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）。也就是说，夏为楚王室的真正祖先，因此，无论是屈原的楚辞中还是楚王室典籍一些言谈礼仪中，都把帝高阳颛顼作为最高象征去歌颂。楚国也从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。自立为王、控扼江汉、富居一方、逐渐吞并了许多姬姓侯国，这只有楚国才敢去作，也只有楚国才能作到。而周朝先祖帝喾高辛，为玄器青阳之孙，黄帝之曾孙（见《史记》），除均为黄帝后裔外，夏、楚与周的血统脉传关系已相当远了。墨子作为楚地臣民，生活在崇夏思想极浓的文化氛围之中，当然会受楚地习俗影响。墨子立学成派之后，与鲁阳文君有着极亲密的关系，其信仰也应较为一致。如果把楚地文化、叶公、鲁阳文君与墨子相联系，便会发现鲁阳作为墨学的发祥地不足为奇。虽然“法夏绌周”思想不是血统地缘关系所能根本决定，但作为一个方面，起码可作一种解释存录待考。

其三，鲁阳早在十几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，自古为夏部落活动区域。夏禹所都之阳翟即今河南禹州市，距鲁阳有百公里之距，夏文化的影响，可以说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更为接近，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记“刘累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龙一雌死，潜醢以食夏后，夏后食之，既之使求之，惧而迁于鲁县”。证明自孔甲始，鲁已为夏

一重要城邑。它比曲阜、滕州的历史都要早得多。

从以上三方面看，无论血缘或是地缘，鲁阳都存在墨家“法夏继周”的必然条件。当一个社会的统治结构处于崩溃，统治思想处于没落之时，新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应运而生，旧的东西不能供其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时，他也会从别的方面吸取营养以适应自身的需要。所以，墨子在非儒非乐非命非攻等否定旧的一系列东西的同时，也在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，这就是兼爱尚贤尚同节俭等主张。为整个社会提供新的思想理论，有破有立，有贬有颂，受到了上至人君、下至庶民的热烈欢迎，因而才能在儒家势力尚且强大，新兴思潮百家争鸣之时，破颖而出，独树一帜。由此而论，墨家“法夏继周”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渊源，只不过，墨家法夏是借夏政去宣传推广自己的理论主张，绝不是对夏政的复古。此均可从《墨子》书中探究，若细心研读，当不言自明。

### 三、墨学的发源地应在楚之鲁阳

从以上论证可以肯定，墨学发源于鲁阳是顺理成章的事，而且，墨学的产生，是先秦儒学势力中落的一个标志。

大家知道，在孔子生前出任鲁国司寇的短时间内，就杀了与自己思想观点不合的少正卯，原因之一就是少正卯聚众讲学，把孔门的学生都吸引了去。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不会轻易丢掉自己的地盘。孔子之后，其弟子出仕于列国宫廷，势力尚为浩大，又岂能容许身边慢慢发展起来一个非议甚至否定他们的“显学”墨家呢？因此说，墨家这一显学，是决不可能在儒士林立的鲁国及周围产生的，只能在远离儒家

势力范围的其它地方产生，这个地方就是鲁阳。

其一，鲁阳虽为楚地，但又并非不开化地区，而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华夏古国。《竹书纪年》载孔甲七年，刘累迁于鲁阳，《春秋分纪》言其“在夏为鲁县”。周朝初年周公首封于此，为王畿之地，后伯禽迁国于曲阜，带国号而为东鲁，鲁阳亦为王封重地。只是到了楚文王时代拓地千里，封畛于汝，才使江淮之地统归于楚。因此说，鲁阳有着产生先进学术思想的传统条件，绝不像张知寒先生所片面认定的鲁阳为荆蛮之地，不可能产生墨家这样先进的科学思想，若依其说，那么道家老子，逍遥家庄子都为楚地人，又怎么解释呢？

其二，鲁阳在春秋末期一段时间内，与古叶邑同为楚方城之外镇边重地。叶公沈诸梁封叶后，励精图治，修陂凿渠，勤于渔桑，重于农事，举荐贤能。平定了白公之乱，身兼令尹、司马二职，以其大略雄才，换来了楚国中兴。墨子对叶公稳定楚国时局、百姓安居乐业当有所闻。《墨子·耕柱》篇中就有一段评价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的一段话，从中可以看出墨子对叶公和孔子都是挺熟知的。不同的是，孔子为墨子主要的批判对象，又是儒家宗师，墨子熟知当不足为怪；而叶公为楚国一邑之尹，若无特殊媒介，就不一定知道得那么清楚。叶公之邑与鲁阳地域相临，不过几十里地，当时又归叶公节制，统称方城之外，墨子与之推心置腹谋划国事的鲁阳文君，正是叶公一手培养并向惠王推荐故司马之子公孙宽，最后叶公辞朝后把楚国司马一职也让给了他。这是一个宽厚忠君之人，楚惠王本要封他到梁（今河南汝州市），被他婉言谢绝，改封为小国鲁阳。墨子的兼爱、尚同、尚

贤思想，与鲁阳文君可说是不谋而合。而叶公的靖边安境，重农轻战，功成身退思想，亦与墨子非攻、守备等思想较为一致。所以，墨子思想得到国君的支持并加以采用，只有在鲁阳文君的地盘内才有可能，而墨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意志，“周秦之学，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，殆莫如墨子矣。其学勇于救国，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，精于治器，善于治守，以寡少之众，保弱小之邦”（易白沙《述墨》）当然同时受到百姓们的支持和拥护。所以我们说，墨家思想的产生，使上至国君下至臣民都从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。而这则是某一学派成为显学的必须条件。

总之，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中落的标志和当时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墨家学说萌生于古鲁阳的丰厚沃土之中，成长于尧山灋水之间，传播于江河大地，三山五岳，最终成为冠世显学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增添了奇异的光彩。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